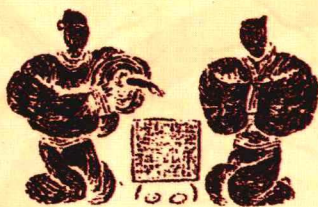


战国百家争鸣与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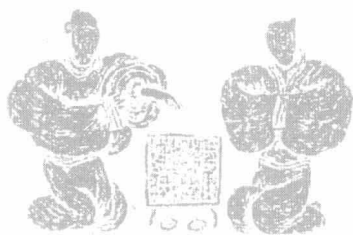
ZHANGUO BAIJIA ZHENGMING YU ZHONGHUA CHUANTONG TIYU
JINGSHEN GOUJIA

王京龙 / 著



战国百家争鸣与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

ZHANGLO BAILIA ZHENGMING YU ZHONGHUA CHUANTONG TIYU
JINGSHEN GOUJIA



王京龙 / 著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王京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01-010741-7

I. ①战… II. ①王… III. ①体育运动史-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IV. ①G81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1193 号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

ZHANGUO BAIJIAZHENGMIN YU ZHONGHUA CHUANTONG TIYU JINGSHEN GOUJIA

王京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7-01-010741-7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一、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	(3)
二、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	(8)
三、体育与中华体育精神的起源	(13)
四、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研究的基本思路	(21)
五、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研究现状	(25)
上 编 学术繁荣：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的文化背景	(29)
一、周代文化发展与战国学术繁荣概述	(31)
二、齐文化与齐文化精神	(36)
(一) 东夷与东夷文化	(37)
(二) 齐国是周代极其重要的诸侯国	(40)
(三) 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渊源	(44)
(四) 齐文化精神	(45)
三、稷下学宫与战国百家争鸣	(52)
(一) 稷下学宫的创办与消亡	(52)
(二) 战国百家争鸣的形成与发展	(57)
(三) 参与战国百家争鸣的重要学派	(62)
四、齐鲁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	(73)
(一) 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观念的形成	(74)
(二) 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发展	(77)

(三) 提供了民族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	(80)
五、战国时期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概览	(85)
(一) 蹴鞠	(85)
(二) 乐舞	(86)
(三) 武术	(89)
(四) 射箭	(92)
(五) 棋戏	(95)
(六) 健身养生术	(100)
六、齐鲁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突出贡献	(102)
(一) 推动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原生本体的成型	(106)
(二) 确立了中华传统体育原生本体的核心点	(108)
(三) 构架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本体	(111)
中 编 百家争鸣：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的基本材料	(117)
一、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19)
(一) 孔子以“礼”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20)
(二) 孟子以“仁”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28)
(三) 荀子以“结于一”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32)
二、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38)
(一) 老子以“法自然”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39)
(二) 杨朱以“为我”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48)
(三) 庄子以“游”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57)
(四) 稷下黄老学派以生命为本体的体育精神主张	(164)
三、墨家以“兼爱”为核心的体育精神主张	(194)
(一) 强烈的团队意识	(196)
(二) 积极的进攻意识	(199)
(三) 强烈的科学探求精神	(202)
(四) 显明的道德要求	(203)
(五) 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	(205)
四、阴阳五行学派辩证思维方式对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 ...	(208)
五、杂家学派对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的贡献	(214)

(一)《管子》反映的军国主义体育精神·····	(214)
(二)《吕氏春秋》反映的体育养生精神·····	(222)
下 编 百虑一致：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基本框架的构建 ·····	(235)
一、精神、体育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	(237)
(一)“精神”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 ·····	(237)
(二)“中华体育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	(243)
二、战国诸子体育思想反思 ·····	(248)
三、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 ·····	(265)
(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	(266)
(二)以静为主的行为要求 ·····	(272)
(三)以德为主的行为规范 ·····	(277)
(四)以利相导的激励原则 ·····	(280)
四、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的基本动因 ·····	(286)
(一)士人阶层的崛起 ·····	(286)
(二)学术思想的繁荣 ·····	(291)
(三)侠义精神的形成 ·····	(294)
(四)珍爱生命意识水平的提升 ·····	(298)
五、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特征 ·····	(301)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	(302)
(二)坚强的集体主义精神 ·····	(305)
(三)任智不任力的竞技精神 ·····	(309)
(四)性命为主的人本精神 ·····	(311)
(五)重德尚礼的参与精神 ·····	(314)
六、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现代发展 ·····	(317)
结论与启示 ·····	(327)
后 记 ·····	(332)

绪 论

体育是人类生活中永远的美味蛋糕，不同的民族文化熔铸了不同的民族体育精神。民族体育精神是民族体育发展的脊柱和基本动力，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先秦诸子思想是最基本的材料，诸子思想的思辨与融合构架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动力支持：一是物质方面的，一是精神方面的。来自物质方面的动力支持是基础，来自精神方面的动力支持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指明方向，两者缺一不可。体育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内容，既可以提供物质方面的动力支持，即身体动能；也可以提供精神方面的动力支持，亦即精神动能。因此，体育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广泛的社会活动之一，哪里有人类的活动，哪里就有体育的存在。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体育”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在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就有了纷繁复杂的“体育”概念。体育精神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升华，但体育精神并不像“体育”概念自身的变化一样不断分化，而是以充分的继承为特征不断地丰富与发展。

关于“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这一题目，本书计划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最初构架的背景、材料和状况。在这里，首先要说一下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几个话题。

一、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

“体育”这一概念，在古代的汉语言当中并不存在，但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却呈现出了日见日新的良好发展局面^①。现在来看，所谓“体育”，大致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育活动，主要是指人的身体行为运动，包括肌体运动和精神运动两个大类，比如跑步、跳跃、投掷、围棋、游戏等。二是体育文化，主要是指对于体育活动的描述或表象而形成的文化现象，以及由于体育活动的延伸而形成的文化制品。这里指的当然主要是精神

^① 参见韩丹《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载《体育与科学》2010年第4期。

层面上的文化产品，比如关于表像体育活动的诗歌、图画、音乐等。三是体育精神，指支配某一地区或民族体育特征形成和发展的系统性思想内涵。体育精神属于哲学层面上的内容，决定着民族体育的根本特征。客观地说，支配人的体育活动的所有意识，都应当是为了身心的健康和愉悦，这是不同民族体育精神的共同特征。但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体育精神，不同的民族体育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区分不同的民族体育的基本要件，正是这些各自不同的民族体育精神。这样，体育活动、体育文化、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体育”。

但体育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又可以各自分为若干不同的层类，比如不同的体育活动就有娱乐性、竞技性、保健性等特征上的差别，体育文化也有产业、公益之不同，体育精神同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别。精神是人的个体和社会群体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没有了精神的支撑，个体的人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群体构成的社会将会土崩瓦解。体育精神对于体育的作用正是如此，它不仅可以主导体育活动的走向，而且可以拓展体育活动的发展空间，更为具体的是，它决定着异彩纷呈的民族体育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说，体育精神既是“体育”本身的一部分，更是“体育”的灵魂。以此为指导，从古至今，体育的发展，总体上是在越来越“胖大”的。具体的现象，单个的分支虽然“肥瘦”不一，长短不齐，但绵延至今，同样都是越来越粗壮。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体育精神的总体发展，方才使得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今天这样红红火火的局面。

体育是人类活动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产品，由于人类的活动形态各异，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不同，不同民族的体育也就呈现出了不同的民族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同样有着辉煌的发展历史。

对于中国古代体育史的系统性研究，现在来看早已非常深入了。郭绍虞先生早在1919年就出版了他的《中国体育史》^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

^① 郭希汾：《中国体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19）。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原名希汾，字绍虞，后以字行世，著名历史学家。

育史著作,有着重要的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唐豪先生主持,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技术委员会组织,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体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9册《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这一工作影响巨大,基本上是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正本”。可惜的是,这一工作刚刚起步便戛然而止,直到十多年后才接续起来。人民体育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出版了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体育史料》,随后多家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诸如《中国体育史》^①、《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②、《中国古代体育史话》^③、《中国近代体育史》^④、《中国古代体育史》^⑤、《中国古代体育》^⑥、《体育史》^⑦、《体育史》^⑧、《体育史》^⑨、《游戏史》^⑩等一大批体育史论著。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翁士勋先生主编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⑪。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整体性宏观研究的黄金时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推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一批体育史研究的成果。不过,这些成果专项性的研究趋势比较明显,至于综合性的研究,有好些沾染了功利色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意不多。总之,检点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成果,可谓琳琅满目、繁花似锦了,这些著作,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成果,大都是以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研究为基础形成的,不管是从数据性上看,还是从思想性上看,对于中国体育史的学科建设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

① 谷世权、杨文清:《中国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李季芳等:《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刘秉果:《中国古代体育史话》,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⑤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古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⑥ 任海:《中国古代体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⑦ 体育史编写组:《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⑧ 郝勤:《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⑨ 谭华:《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⑩ 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⑪ 翁士勋:《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对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李庆洪先生就曾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体育诗选》^①,书中辑录最早的体育诗歌是东汉三国时期曹操父子的两首诗,一是曹操的《龟虽寿》,诗中并没有写出具体的体育活动,仅是提出了“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养生观念;一是曹植的《名都篇》^②,是在描述都市之繁华过程中对于娱乐活动的捎带性记述。书中还选录了诸如唐代归氏子《答皮日休字诗》^③的专题记述蹴鞠制作方法的诗歌:“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煨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颇具史料价值。其实,关于中国古代描写体育娱乐活动的文学作品很多,《诗经》当中就有不少,只不过有意识描写体育活动的专题作品倒是十分罕见。有意识的专题作品,大约是在汉武帝时期才出现的。汉赋大家枚乘的儿子枚皋,作为御用文人就曾经跟随汉武帝写过这类的专题文章,《汉书》记载说:“皋为赋善于朔也。从行……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④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画像砖、石,其中对于体育娱乐活动的刻画,也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和体育研究的史料价值^⑤。现今关于这一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能够见到的大多是一些古代作品的汇集、选集之类^⑥的作品。魏宏灿先生的《从我国古代诗词看女性体育活动》^⑦之类的论文,可谓寥寥。

对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的研究,除却体育史研究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和散见于报刊上的众多论文以外,2008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崔乐泉等先生编写的《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近代、现代三卷本)^⑧,这部巨著

① 李庆洪:《中国古代体育诗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李庆洪:《中国古代体育诗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③ 李庆洪:《中国古代体育诗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④ [汉]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⑤ 参见陈海华《汉代画像石上的人文与体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⑥ 参见路今铎、金磊《中国古代体育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 参见魏宏灿《从我国古代诗词看女性体育活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 参见崔乐泉、杨向东主编《中国体育思想史》三卷本: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傅砚农、曹守和、赵玉梅、苏肖晴:《中国体育思想史》(现代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是目前看来最为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体育思想研究的著作，大框架地对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的体育思想发展状况给予了整理与贯连。关于体育精神方面的专项研究成果，当前看来，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当属黄莉先生的《中华体育精神研究》^①。这部著作立足于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现代哲学透视，可惜并没有从源头上探求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来龙去脉。

概括来看，以往对于中国古代体育的研究，实际上过多地关注于体育活动方面，在体育文化、体育精神方面仍然还存在着很大的开拓空间。即使在2008年崔乐泉先生主编的《中国体育通史》^② 8卷本出版以后，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我们的国人本来对于体育活动的关注就远远不够，对于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了。这却又正是我们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者需要倍加努力的方向。毋庸置疑，对于古代体育活动的研究，是我们对于古代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研究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恰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来说，确实形成了很大的推动力，《中国体育通史》、《中国体育思想史》等鸿篇巨制，都是其影响下的直接产物，代表着中国古代体育研究的新水平。

在以往研究中国体育思想史的著作当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专著。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我们却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研究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正是这些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在世界文化当中应当有着独立的地位。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氛围当中，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精神表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个特色鲜明而又自成一统的文化体系，在东方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和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人文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个大的系统。近代以来，检讨中国人文精神这一问题的学者和著作虽然不胜枚举，但被誉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先生在这一领域无疑属于重要的开拓者和佼佼者，他曾明确指出：“中国人的精神，是那种中国人赖以生存之物，是该民族在心、性和情方面的独特之处。这种

① 参见黄莉《中华体育精神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8卷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精神使之有别于任何民族，特别是有别于现代的欧美人。”^① 中国的文化只能滋生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便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是东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体育的根本支柱。当然，这仍然还是一个大题目。我们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最初构架，确切地说，对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研究而言，构成只是一个最基础的框架，还不能够勾勒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发展的全貌。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中凝炼而成的宝贵财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异常丰富的国家，民族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代表的是中华体育精神的特殊性，而不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体育精神所共有的同一性。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本课题所能够包容得下的。

二、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构架”这一题目，既属于体育学的范畴，更是历史学当中的内容。讨论这一课题所要分析的材料，应当归之于历史学范畴，而分析这些材料所形成的结果，无疑却又要归属于体育学的范畴。由于古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现代人这样细致的学科分类，甚至个人非常专一的偏好也不是很突出，而是把应当做好与喜欢做好的事情全部“和”在了一起的，并不存在舍此就彼的问题，这样也就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魔球”，使得我们今天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利用它。具体地说，研习体育的人同样喜欢读书，读书的人视体育为风雅之物，两者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这与我们今天所谓的“隔行如隔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用现代的学科分类方法对待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学科分类问题，实在是削足适履了。但没有办法，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客观地说，春秋战国之际，虽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但从体育学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细致化、文武分途的趋势已经显现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重文轻武思想理念的出现虽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好简单地说明清

^①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楚,但这时候确也已经有了“文武分途”的萌芽^①。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时代模型,必然会熔铸出不同的时代产品。具体表现在,横向上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体育风貌,表现着不同特征的体育精神;纵向上看,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及其精神,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为依托,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巨柱。因此,我们认识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最初构架情况,依据的就是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基础。

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是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璀璨明珠。纵观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历史演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可以框定在周秦时期。这一时段以战国百家争鸣为中心,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基本框架的构架时期,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凝聚成型,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第二时段可以框定在汉唐时期,这一时段以多民族文化的高度包容和大规模的地域扩张为标志,对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补充和完善。第三时段以宋明理学的兴盛为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原生状态,我们今天所不断指责的中国古代民族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弊端,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现在我们检视中国古代的体育发展,有很多现象就带有自宋代以来到明清时期被极度扭曲而成的影子。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体系,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源头,要认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发展状况,显然必须要以这些思想为基本材料。

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的诸子思想体系,无可争辩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春秋战国之际,受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的大势影响,众多文化巨子纵横驰说,各执一端,形成了同声异曲、门派林立、异彩纷呈的宏伟景象。战国时期的时候,这些学派形成了一个大的整合过程,这便是战国百家争鸣。《孟子》中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②《韩非子》写道:“世之显学,儒墨也。”^③孟子、韩非子

①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古代体育史》:春秋战国时代,只有“文武分途”的发生,尚无“重文轻武”的思想,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② [清]焦循:《孟子正义·滕文公·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269页。

③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显学》,《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351页。

的观点可能都有些偏颇,因为据钱穆^①和张秉楠^②先生的考证来看,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中心稷下学宫里边,道家学派比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都更为壮大;墨子几与孟子同时代而略早^③,而墨子与齐国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密切^④。但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学术门派和思想流派已经形成了突出的亮点。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并没有形成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礼乐文化还一直在起着潜意识的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流形成,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逐渐上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以后的事情,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所有先秦以前的诸子百家,差不多全部会合到了秦以后的所谓儒家里面去了。”^⑤这个“会合”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是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整合,其次便是确立了儒学的主流文化地位。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的诸子思辨,实际上也是一个思想学术活动的大融合过程,它的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便是创造性地形成了众多的诸子思想体系,为汉代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材料。正因为如此,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思想精神对于体育发展产生的影响才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早在20世纪初期,郭绍虞先生在他的《中国体育史》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儒家、道家二者而已,儒家重礼义,道家尚无为,“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体育史》是研究中国古代体育的开山之作,此说发端于外国列强大举入侵之际,因而充满了振臂疾呼的味道。而与之同时代的胡适先生也曾发出过类似的呐喊:“人的心思并不是独立于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灵的,还有什么心思可说?中国古来的读书人的大病正在专用记忆力,却不管别的官能。到后来只能变成一班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⑦这些言论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时代烙印,虽然观点鲜明,掷地有声,但大都不乏过激偏颇之嫌。先秦诸子的思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育思想,本质上完全没有让人们成为

①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8页。

② 参见张秉楠《稷下钩沉·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墨子生卒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页。

④ 参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⑤ 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页。

⑥ 郭希汾:《中国体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19),第4页。

⑦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的意思。真正对于人们的体育思想观念形成这种严重影响的，是封建社会中后期以来的封建伦理统治对于体育观念的畸形制约，而不是儒学、道学自身的主旨使然。由此来看，认识战国百家争鸣过程中的体育思想，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正本清源之意。

大致看来，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最初构架，与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兴起与发展。周代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从“周郑交质”^① 开始便拉开了以拱卫王室为招牌的诸侯争霸序幕。而后，从齐桓公到晋文公等诸侯相继轮番称霸，文交武斗不绝如缕。但这些争霸斗争，“拱卫王室”的幌子之下掩盖着的本质，不过就是各个诸侯国争取自我的发展空间而已，为了一己之利，扯大旗作虎皮，弱肉强食。一言以蔽之，整个春秋近四百年的诸侯争霸斗争历史，既是周王室走向式微的发展史，更是天下诸侯们“窝里斗”的争霸斗争史。春秋初、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并没有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改变这种天下大乱的社会局面提出可行性对策。因为失于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的缘故，春秋霸主所有“霸诸侯，匡天下”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都在倏忽之间退出了历史舞台。到春秋末期的时候，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对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孔子发出了“克己复礼”^② 的大声疾呼，可惜成效并不显著，因为孔子的主张认定了以往政治制度的正确性，便以恢复旧有秩序为其根本的理论基础，主张让天下诸侯们“克己复礼”。这一措施，面对力务争霸的诸侯们来说，无异于空手论道，与虎谋皮。这样，孔子的主张在急功近利的诸侯们那里自然不会有几个买点。与孔子不同的是，老子看到了以往政治制度的严重缺陷，提出了一套“树大自然直”的办法，主张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③。老子提出的办法虽然直接逆向于孔子，但当时的情状，周天子想“有为”而实“无为”，各诸侯正“有为”而怕“无为”。办法虽好，同样不切合实际，只能称其为美妙的清谈。所以，孔子之说，在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三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页。

②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颜渊》，《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262页。

③ [三国]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章》，《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2页。